

邺城遗址出土北齐石塔及相关图像的探讨

何利群

关键词：邺城 北齐 石塔 神王

KEYWORDS: Yecheng Northern Qi Stone Pagoda Spirit Kings

ABSTRACT: A Northern Qi stone pagoda was unearthed from the Beiwuzhuang hoard of Buddhist sculptures at the Yecheng site in 2012. It is a stupa-shaped pagoda. The central statue is Shakyamuni of a style that has existed since the Tianbao reign of the Northern Qi. The Bodhisattva bears characteristics that prevailed during the late Eastern Wei through the early Northern Qi. The style of niche consists of a typical openwork backdrop formed by two trees. The deity statue carved at the base is a common guardian image during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periods in the Yecheng area,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pocalyptic, protectionist thought common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郭城区的北吴庄抢救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时代主要为东魏北齐时期，另有少量的北魏及隋唐造像^[1]。其中一件北齐时期造像塔，造型别致，图像精美，是北朝晚期的石刻造像精品^[2]。

一、石塔的形制与图像

该塔为方形底座覆钵式，白石质，残高100.1厘米，分为底座、塔身、覆钵和塔刹四部分，主体基本完整，局部尚存红色彩绘的痕迹。底座宽52、高21.7、厚47.2~54.2厘米，四面分别雕出双狮、香炉、力士、神王和伎乐形象。塔身高约50厘米，四面开龕造像，龕分内外两重，内龕雕在塔心方柱之

上，外缘立复合式龕柱。上部为山花蕉叶，浮雕勾旋的线形涡卷图案。覆钵半球形，直径30、高18厘米。塔刹残损，顶端中心有一个小方孔，从断面看或为后期修补形成的槽孔。以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描述石塔四面。

石塔正面 塔身中部方柱内龕为圆拱形，高浮雕结跏趺坐佛，面相浑圆，肉髻扁平，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下摆覆搭座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在左膝上挽持袈裟衣角。莲座半圆形，束腰，上部素面，下部雕出短厚的仰莲瓣。莲座前有两身跪姿供养人，左像头部残，侧身胡跪，双手合十，右像仅存膝部以下。外龕呈双树缠绕状，树干底部为山石形，外侧雕出覆莲础多棱柱，柱顶刻摩尼宝珠。树干内侧浮雕二胁侍菩萨，头戴三叶式冠，宝缙垂肩，面相较圆，上身半裸，一手屈至胸前，一手置腹侧，下身着

作者：何利群，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贴体长裙，披帛缠肩绕臂下垂，跣足立于长茎莲台上。坐佛上方龕楣为交织的树冠，有六瓣式花朵，中心托半球形花蕊。树冠下有四身飞天，面容姣好，发式中分，体态轻盈，双手在胸前持宝珠状物。其上为山花蕉叶和覆钵，覆钵上墨书“王通”二字，疑为后代补写。方形底座正面雕出双狮香炉及力士形象。香炉结构复杂，中部为莲瓣支托博山式炉身，两侧陪衬翻卷的荷叶、莲蕾及半开的花朵。双狮面向中央，头微偏向外侧，右狮颈部鬃毛蓬张，双狮均竖耳，呲牙，尾部上扬，作侧身蹲踞状。二力士面相方圆，头戴冠，宝缯垂于肘下，身着圆领直襟短袍，肩披帛，腰束带，下身着裤褶，一手在

身侧握持曲节棍状物。力士与狮子之间各有一个方槽，其内尚存锈蚀的铁棒（图一；图二）。

石塔右侧面 塔身内龕呈帷帐形，主尊结跏趺坐，身穿袒右袈裟，内着僧祇支，面相、服饰同正面龕像。双臂前端均残，右前臂处有修补形成的槽孔。仰覆莲座，上部为大型单瓣，下部为宝装复瓣。两侧各有一身卧狮，侧身昂首，屈肢作卧伏状。外龕双树及多棱柱同前，内侧为二胁侍菩萨。坐佛上方残存缠绕的枝桠，其下四身飞天，头梳双髻，披帛飘扬，双手在腹前捧持摩尼宝珠。塔身上端山花蕉叶与覆钵同前述。底座中部为香炉、力士，香炉为莲花式，两侧陪衬荷



图一 北齐石塔正立面图



图二 北齐石塔正面

叶、莲蕾，下有半身裸体童子托举。力士均头戴冠，面目粗犷，上身半裸，肩披帛，腰束带，一手侧举至胸前或肩侧，一手置腰间，下着裙裤，身躯侧扭，跣足而立。力士两侧各开一个小尖楣龕，内雕两身神王。右侧为风神王，长发斜吹向一侧，身穿圆领直襟袍服，腰部束带，脚着短靴，双手在腹前抱持风袋，交足坐。左侧神王头戴三叶形冠，缯带下垂，服饰、姿势同右侧神王，左手抚膝侧，右手在腹前捧持宝珠状物（图三；图四）。

石塔背面 塔身内龕呈圆拱形，龕内结跏趺坐佛面相、服饰、姿势同前。右手前端残，可见修补形成的槽孔。莲座类似正面像

座，半圆形，束腰，上部素面，下部为大单瓣仰覆莲样式，莲瓣为红色彩绘，边缘以粗墨线勾勒。莲座前有两身舒腿坐像，右像残半，仅辨坐姿；左像完整，为童子形象，面容俊秀，一手抚膝，一手置于足下，身部未见衣饰痕，似为裸体。外龕树干、多棱龕柱同前，内侧为二胁侍菩萨。上缘破坏较为严重，花树无存。内龕上方四身飞天面相、服饰接近正面龕像中的飞天，外侧两身飞天在胸前捧珠饰，内侧两身飞天共同托持一件摩尼宝珠。底座并列四个尖楣小龕，其内各雕一身神王，均着圆领直襟袍服，腰束带，足蹬短靴，舒腿坐姿。右一为河神王，头戴宝冠，左手抚膝，右手在肩后托大鱼。右二为



图三 北齐石塔右侧立面图



图四 北齐石塔右侧面

象神王，长鼻，双牙，象首，一手抚膝，一手托鼻。右三为狮子神王，头戴狮头帽。右四神王残损严重。中间两小龕外侧各有一个纵长方形槽孔，内有锈蚀的铁棒，与石塔底座正面槽孔相似（图五；图六）。

石塔左侧面 塔身内龕为帷帐形，主尊为结跏趺坐菩萨，头戴矮冠，面容圆润，宝缯垂至肘下，披帛在腹部交叉，右手上举，前端残，左手在腹前作与愿印。像座为半圆形束腰须弥座，两层叠涩，光素无纹。座前两身卧狮，屈卧作趴伏状。外龕树干及多棱柱中部残，内侧为胁侍弟子。外龕上部为缠绕的树干，树冠略呈弧边三角形，内有摩尼珠形图案。树冠下六身飞天，面容、发型、服饰同正面龕像，中央两身托举舍利塔，

两侧四身各在胸前捧物。底座中部为莲花香炉，下有蹲坐状半裸童子托举。香炉两侧各有一身供养比丘。右比丘面部略残，身着袒右式僧服，双手在腹前持圆筒状物，跣足而立。左比丘仅存头与足部。底座外侧有两个尖楣小龕，内雕伎乐，均头戴三叶形冠，身穿圆领袍服，腰束带，足着靴，与神王装束一致，右像手握横笛，左像手持排箫作吹奏状（图七；图八）。

二、石塔的时代与造型特征

汉末以来的中国早期佛塔的图像和实物大体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保留较多印度风格的覆钵式塔，如龟兹石窟壁画中的方塔及河西地区的北凉石塔；二为结合中国高台建



图五 北齐石塔背立面图



图六 北齐石塔背面

筑和印度塔刹结构的楼阁式塔，如四川什邡东汉画像砖上的佛塔、北魏曹天度造塔及云冈石窟中大量的楼阁式塔。

北吴庄出土的这件石塔属于具有西域风格的单层覆钵塔，中原地区类似的浮雕图像最早见于云冈二期石窟^[3]。塔中坐像时代特征明确，三尊坐佛均面相圆润，肉髻扁平，身着薄软贴体的袒右袈裟，下裾较短，搭覆座上，此为公元6世纪中期受笈多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典型的北齐新样式佛像^[4]。以缠绕的双树构成外龛的造型最早见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公元6世纪前半期的石造四面像^[5]，北齐以来这种造型成为邺城地区“龙树背龛”式造像的基本构图特征。石塔正面底座上鬃毛蓬张的狮子及左侧

菩萨披帛在腹部交叉的特点也正是东魏晚期造像要素在北齐初年的延续^[6]，故北吴庄出土的这件石塔时代当在北齐较早阶段。

与北魏时期流行楼阁式塔不同，东魏北齐时期的邺下多见印度文化因素较多的覆钵塔^[7]。这一时期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发现的背屏式造像上方普遍有此类单层覆钵塔，河北邺城、山东青州等地出土的造像中表现尤为显著，另在河北曲阳、景县、邢台，山西太原及河南地区的东魏北齐造像中也常见。最具特色的是南、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部分洞窟外立面呈覆钵塔形^[8]。北响堂山石窟北洞和南响堂山1号窟壁面还浮雕多座单层覆钵塔^[9]，其中北响堂山北洞两侧壁和后壁16座覆钵塔的普遍特征是下有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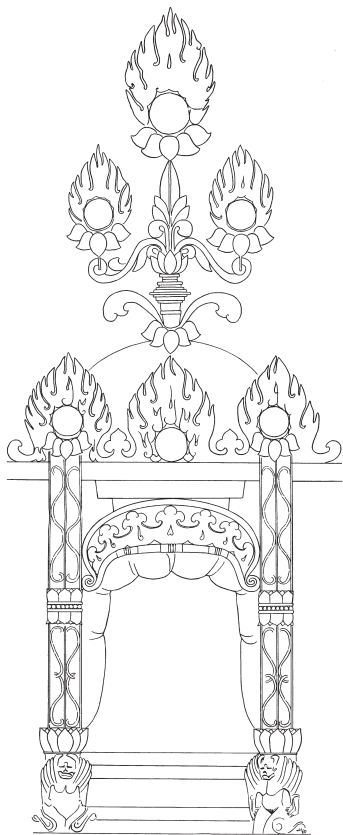
图七 北齐石塔左侧立面图



图八 北齐石塔左侧面

塔身开龕造像，龕形呈帷帳式，龕楣饰变形忍冬纹，两侧雕出束莲柱，上部为宝珠式的山花蕉叶及半球形覆钵。塔刹分三股，上饰摩尼宝珠（图九）。南响堂山1号窟左壁后端覆钵塔的龕形装饰及塔刹细部与前者略有区别，但塔的样式及造型特征（图一〇）均与北吴庄出土石塔相近。形制类似且有明确纪年的实例是宝山灵泉寺道凭石塔，现存一对，造型相同，均为单层方形石塔，由基座、塔身、覆钵和塔刹构成。西塔通高146厘米，方形基座分为两层，底宽115厘米，塔身高45厘米，正面开龕，尖拱楣，两侧立龕柱。龕右侧竖刻“大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三月十七日”，龕上方横刻“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上部为勾旋卷叶式

的山花蕉叶，平圆覆钵，其上为倒梯形平头和三重相轮，塔尖为宝珠形（图一一）。在灵泉寺周边的宝山和岚峰山崖壁上现存大量隋唐时期浮雕的僧尼灰身塔，其中单层覆钵式塔约有一百余处，占绝大多数，这些塔应该是受了道凭石塔及北朝晚期末法思想的影响^[10]。另外，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周至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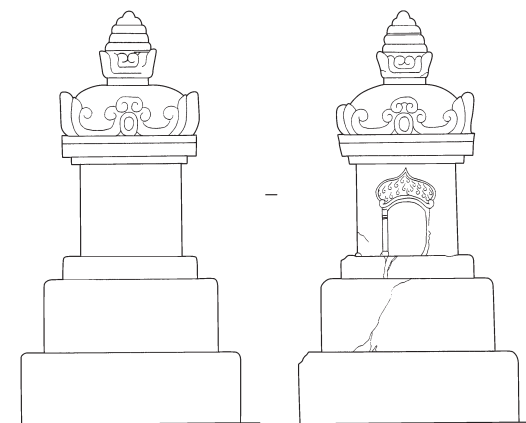


图九 北响堂山石窟北洞覆钵塔

（图据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第二編图四十四，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



图一〇 南响堂山1号窟左壁覆钵塔



图一一 安阳宝山灵泉寺道凭石塔

（图据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宝山灵泉寺》第128页图二、图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内，亦曾出土多件小型的单层方形石塔，时代明确的有日本滨松美术馆藏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石塔、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石塔、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石塔、东京艺术大学藏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石塔等^[11]。虽然上述北周至隋代石塔与北吴庄北齐石塔同属单层覆钵式塔，但二者的造像样式迥然不同。前者主尊多身着褒衣博带式或垂领式袈裟，衣摆下悬座下；尚属承袭北魏晚期传统的西魏北周造像形式，而后者则均为身着薄软贴体袒右袈裟的北齐新样式佛像。

覆钵式塔源于古印度本土，今北印度的桑奇大塔、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大塔、西印度早期石窟寺中的佛塔^[12]，以及公元3世纪之前犍陀罗地区的布特卡拉、塞杜沙里夫佛寺的佛塔等^[13]都是以硕大的半球状覆钵为主要特征。而方形底座、塔身开龕的覆钵塔则是在公元4世纪以后的中亚及新疆地区较为常见，如克孜尔石窟第7、17、38、80、107A、205窟等中心柱窟甬道及主室券顶壁画中的单层塔^[14]，其造型明显偏重于塔身的龕像而非覆钵，究其根源，似与公元1世纪之后以佛像为代表的圣像崇拜逐渐取代了早期对圣迹、圣物的崇拜有关。邺城地区北朝晚期的单层塔与龟兹地区流行的塔型近似，无论是北吴庄出土的北齐石塔、南北响堂山的塔形窟龕，亦或是灵泉寺灰身塔，三者功能上虽有不同，但形制和造型特征具有明显的时代共性，此类极具特色的单层覆钵塔及新样式佛像的流行，当与北朝晚期与西域的广泛交流以及北齐皇室的西胡化倾向^[15]有一定的关联。

三、三佛一菩萨的图像意义

东晋十六国以降，因政治分野、文化传统及僧团邑社等多方面的因素，佛教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日渐显著，南方偏尚玄学义

理，而北方特重禅修实践^[16]。西起敦煌与河西陇东石窟^[17]，东迄云冈、龙门石窟，洞窟造像中的三佛通常是与禅修密切相关的过去（定光、燃灯或迦叶）、现在（释迦）和未来（弥勒）三世诸佛^[18]。自北魏孝文帝改制以来，北方义学日渐繁盛，至北朝晚期和隋代初年，随着佛学思想的发展和崇拜对象的多元化，邺城石窟造像的题材也有了一定的演变。三佛组合除继承北魏以来的纵三世佛外，还出现了包含卢舍那、无量寿（阿弥陀）在内的新式组合。如邺城北吴庄出土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作兴造像塔，三面开龕造像，正面龕像结跏趺坐，左龕佛立姿，右龕佛倚坐，均作施无畏印，背面题刻“大魏永安二年八月六日，清信士作兴仰为亡妣敬造释迦、定光、无量寿三身像，愿令亡妣托生净土……”^[19]。安阳小南海石窟现存东、西、中三个洞窟，大小相仿，形制、题材相近，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北齐天保年间^[20]。中窟内三壁雕造三佛，正壁由壁面浮雕的“舍身闻偈”故事可判断为释迦佛^[21]。东壁主尊为弥勒佛，壁面浮雕弥勒兜率天说法图，弥勒居中作说法状，周边围绕闻法天人，旁有题刻“弥勒为天众说法时”。西壁主尊为阿弥陀佛，壁面浮雕楼阁、树木、莲花、水池，旁边的“七宝宝树”、“五百宝楼”、“八功德水”及九品往生的题刻出自《观无量寿佛经》的十六观。东、西两窟的雕刻题材及布局方式与中窟类似，均为东壁浮雕弥勒说法图，西壁浮雕十六观图像^[22]。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开窟题记中明确提及“大隋开皇九年己酉岁敬造……卢舍那世尊一龕，阿弥陀世尊一龕，弥勒世尊一龕”^[23]，反映了华严、法华和净土等多种佛学思想在邺下的融合。

从造像铭及摩崖题刻方面来看，北朝末年中原北方东部地区最常见的是释迦、弥勒和阿弥陀三尊组合。除小南海石窟外，实例还见于河南襄城县孙庄村出土天统四年（公

元568年)张伏惠造像碑和河南浚县酸枣庙村佛时寺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造像碑^[24],根据铭文可确认两碑正面从上至下的三龕内依次雕刻弥勒、释迦和阿弥陀(或无量寿)^[25]。山东邹县岗山摩崖石刻上也发现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大字题刻的释迦文佛、弥勒尊佛和阿弥陀佛名号^[26]。

确认北吴庄出土北齐石塔三佛一菩萨的神格并无明确的证据。需要注意的是,邺城地区北魏以来出现的三佛造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纵三世佛,释迦、弥勒、阿弥陀或卢舍那、弥勒和阿弥陀几类组合中都包含弥勒图像,且多为表现弥勒下生成佛的形象,因此该石塔上三佛一菩萨组合中的菩萨像基本可以排除弥勒菩萨。佛教自东传中土至南北朝时期,以菩萨造型为主要尊像的主要是释迦菩萨、弥勒菩萨和观世音菩萨,释迦菩萨多以半跏坐思惟太子像示人,弥勒菩萨则以表现上生兜率天宫的交足坐姿为主要特征^[27],犍陀罗、新疆、河西乃至中原北方及南方各地基本遵循这一规律。其他如文殊、普贤和大势至菩萨只是出现在特定的维摩变或西方净土等图像中,鲜以独立的尊格存在。惟有观世音菩萨,随着法华经典,特别是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风靡中土,公元5世纪晚期以后,成为北方僧尼和平民造像最重要的题材^[28]。而东魏北齐时期盛行的救难渡厄、消除诸苦的《高王观世音经》更将观音崇拜在民间推向顶峰^[29],统计邺城遗址和曲阳修德寺等地出土的大量造像题记,主尊为观世音的造像在北朝晚期各种题材中已明显居于首位^[30]。北吴庄石塔上的菩萨是较为少见的结跏趺坐,目前发现各类有题记的观世音造像虽以立姿为主,但在早期文献中亦不乏结跏趺坐的记载,如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载“见观世音菩萨住山西阿,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鬱茂地草柔软,结跏趺坐金刚宝座。无量菩萨恭敬围绕,而为演说大慈悲经,普摄

众生”^[31]。刘宋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载“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过中夜分明相出时。观世音菩萨于七宝菩提树下,结加趺坐成等正觉”^[32]。故北吴庄出土北齐石塔上结跏趺坐的菩萨或为观世音菩萨。《金石萃编》收录了与之时代相近的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圣母寺造像碑,其南、北、西、东四面分别雕造释迦、弥勒、无量寿和观世音四尊^[33]。以上材料均为探讨北吴庄出土北齐石塔三佛一菩萨的题材属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邺城地区神王像的组合及意义

北吴庄北齐石塔基座上的神王形象是这一时期邺城流行的造像题材。神王是早期佛教经典中记载的护法,通常成组雕刻在石窟壁面底部、中心柱基坛及背屏式造像基座上,西起河西,东至河北,十六国、北魏至东魏北齐时期均有类似形象发现。另有一类大型神王雕造于石窟窟门两侧,亦多见于北朝晚期邺城地区。

佛经中有关神王的名称和组合各异,但均以天、地、海、河、山、树、火、风、鸟、狮、龙、象等自然神为主,实物则以美国波士顿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藏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骆子宽造释迦像为代表。该像底座雕刻十身神王,背面四身,两侧面各三身,均上身半裸,肩披帛,舒腿或交足坐。根据榜题,依右旋顺序可确认分别为龙神王(龙头)、风神王(飘发,手持风袋)、珠神王(口吐联珠)、火神王(焰发,手持火炬)、树神王(右手扶树)、山神王(坐靠山石)、河神王(双肩负鱼)、象神王(长鼻兽首)、鸟神王(尖喙鸟首)和狮子神王(狮头帽)^[34]。有关神王的探讨始见于20世纪初以来的欧美学者著述^[35],近年国内许多学者就神王像的起源、名称、分布区域、

经典出处和造型特点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36]，此处不再赘述。

邺城地区是东魏北齐时期神王造像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其周边比较重要的石窟寺普遍发现过神王形象（表一），而在邺城及京畿地区历年出土的造像中涉及神王的数量甚多（表二；图一二至图二二）。

邺城地区北朝晚期神王像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主要雕凿于石窟壁面底部、中心柱基坛或造像底座之上，东魏晚期开始较多出现，北齐时数量最多，隋以后有少量发现。神王多刻在带龕柱的尖楣小龕内，少数无龕，个别一龕双像。足蹬短靴、具甲装的服饰颇具特色，从面容、发型、服饰、姿势分析应来源于中亚或西亚的人物形象^[37]。各神王排序无明显规律，组合也没有固定数量，有六身、八身、九身、十身和十二身组合，以八身和六身组合较为普遍。风、火、山、树、河、珠、鸟、象、龙及狮子神王俱有，其类型和特征均未超出骞子宽造像十神王范畴，只是多见一类单持一枚摩尼宝珠的神王，有时与口吐联珠的神王同时出现。

中国本土的神王形象可上溯到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北魏建都洛阳时期初步成型，但极度盛行于北朝晚期的邺城周边区域，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末法思想有关。末法之概念由来已久，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一些著名经典中均有相关论述^[38]，也见于同时期的北凉石

塔上的题记。如酒泉出土白双口塔发愿文载“凉故沮渠缘禾三年岁次甲戌（公元434年）七月上旬，清信士白双口自惟薄福，生值末法，波流苦深，……即于山岩步负斯石，起灵塔尊一窟，形容端严”。程段儿石塔发愿文则提到“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公元436年）六月中旬，程段儿自惟薄福，生值末世，不观佛典，自竭为父母合家立此石塔形象，愿以此福，成无上道”^[39]。由此可见，末法思想此时已在河西地区流传，并影响到了普通信徒的行为，与此对应的是北凉石塔上也出现了最早的神王形象^[40]。

在北朝晚期的邺下，末法思想甚嚣尘上，北齐那连提离耶舍在邺城翻译的《大集经·月藏分》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三论宗的吉藏，三阶教的信行，净土宗的道绰、善导等人皆以此经为据讲述末法思想^[41]，今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内外尚存该经的《分布阎浮提品》和《法灭尽品》^[42]。北齐高僧慧思对末法思想进行了系统归纳，在其自传体的《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详细论述了正、像、末时代的划分，以及末法时期佛法

表一 邺城地区石窟中的神王

地点	时代	窟形	位置	数量	类型与组合	服饰	姿势
大留圣窟	东魏	三壁设坛窟	侧壁基坛	8身	右壁4: ▲、象、河、山 左壁4: 树、风、火、△	筒具甲装，着短靴	舒腿坐
北响堂山北洞	东魏北齐	中心柱窟	塔柱基坛	8身	正壁4: 火、鸟、△、△ 右壁2: 树、河 左壁2: 狮(?)、风	具甲装，披帛，着短靴	舒腿坐或交足盘坐
北响堂山中洞	北齐	中心柱窟	塔柱基坛	8身	正壁4: △、风、△、▲ 右壁2: 鸟、河 左壁2: △、火	具甲装，披帛，着短靴	舒腿坐
南响堂山5号窟	北齐	三壁设坛窟	三壁基坛	6身	正壁2: 鸟、象 左壁2: 树、山 右壁2: 火、风	裸上身	舒腿坐或交足盘坐
南响堂山7号窟	北齐	三壁三龕窟	三壁基坛	10身	正壁4: 树、象(?)、风、鸟(?) 左壁4: 河、山(?)、珠、△ 右壁2: △、△	裸上身或筒具甲装	舒腿坐或盘坐
水浴寺西窟	北齐	中心柱窟	塔柱基坛	6身	正壁2: △、△ 右壁2: △、树 左壁2: 火、风	具甲装，肩披帛，着短靴	舒腿坐或盘坐
小南海中窟	北齐	三壁设坛窟	侧壁基坛	6身	右壁3: 风、△、△ 左壁3: △、△、树	裸上身	盘坐
大住圣窟	隋	三壁三龕窟	正壁基坛	8身	正壁8: 树(?)、山、△、△、△、火(?)、△、△	筒具甲装，条缕状发式	舒腿坐

说明：“△”表示无明显特征的神王，“▲”表示手托一枚摩尼宝珠的神王。

表二 邺城出土造像中的神王

造像名称	出土地点	时代	位置	数量	类型与组合	服饰	姿势
张景章造观世音像(2012JYNH1:2725)	北吴庄	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	基座两侧和背面	6身	右侧2: 鸟、△ 背面2: 狮、龙 左侧2: △、珠	均裸上身,部分头戴三叶形冠,冠侧有牛角形发辮	舒腿坐或交足坐
弄女造弥勒像(2012JYNH1:366等)	北吴庄	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	基座两侧和背面	6身	右侧2: 火、鸟 背面2: 珠、象 左侧2: △、风	均裸上身,披帛绕臂,下着禅裙,跣足或着短靴	舒腿坐
莲花像座(文823)	上柳村东北	东魏北齐	基座两侧和背面	9身	右侧3: 树、风、山 背面3: 狮、火、▲ 左侧3: 珠、河、象	上半身裸或穿交领袍服,披帛绕颈,宝缯下垂	舒腿或盘坐
造像底座(文270)	上柳村北	东魏北齐	基座四面	12身	正面6: 山、龙、火、风、象、珠 右侧2: 鸟、树 背面2: ▲、▲ 左侧2: ▲、▲	均裸上身,下着禅裙,脚着短靴	舒腿或交足坐
造像底座(临漳县文保所采集)	不明	东魏北齐	基座两侧	12身	右侧6: 风、火、象、鸟(?)、树、山 左侧6: 狮、△、▲、△、△、△	圆领或翻领袍服,条缕状发式	舒腿坐、交足坐、蹲坐或跪坐
造像底座(临漳县文保所采集)	井龙村	东魏北齐	基座四面	12身	正面3: 鸟(?)、△、△ 右侧3: △、△、△ 背面3: △、△、△ 左侧3: △、△、△	个别具甲装,多裸上身,有项饰或斜披串饰	舒腿坐、盘坐或蹲坐
长孙氏造阿弥陀像(2012JYNH1:282等)	北吴庄	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	基座正面及两侧	8身	正面2: 山、火 右侧3: 河、龙、风 左侧3: ▲、象、狮	身具甲装,肩披帛,着短靴	舒腿坐
法棱造像(2012JYNH1:559等)	北吴庄	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	基座两侧和背面	8身	右侧2: 山、树 背面4: 河、狮、象、△ 左侧2: 珠、风	上身半裸,肩披帛,着短靴	舒腿坐或盘坐
石塔(2012JYNH1:51等)	北吴庄	北齐	基座右侧及背面	6身	右侧2: 风、▲ 背面4: △、狮、象、河	圆领对襟袍服,肩披帛,腰束带,着短靴	舒腿坐或交足坐
佛坐七尊像(编号1116)	上柳村	北齐	基座背面	8身	背面8: 鸟、河、树、▲、▲、风、象、▲	上身半裸,腰束带	舒腿坐
弥勒七尊像(编号1117)	上柳村	北齐	基座两侧和背面	8身	右侧2: 火、山 背面4: 河、象、鸟、珠 左侧2: 风、树	上身半裸,着短靴	舒腿坐或盘坐
弥勒七尊像(2012JYNH1:2601等)	北吴庄	北齐	基座两侧和背面	8身	右侧2: 狮、象 背面4: 树、火、风、山 左侧2: 河、鸟	裸上身,着短靴	舒腿坐

说明:“△”表示无明确特征的神王,“▲”表示手托一枚摩尼宝珠的神王。

衰亡、世间恶行等种种现象,表达了造经护法的强烈愿望^[43]。而出身邺下的信行、僧邕创立的三教更是将末法思想发展至登峰造极^[44]。

末法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佛法衰败,众恶泛滥,邪魔外道破坏佛法,毁经灭像,摧残信众。为使佛法不灭,经典永存,中原北方地区在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佛教摩崖刻经,形成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河

北地区和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两大刻经密集分布区域^[45]。原本就属于护法性质的神王在末法思潮风行的时代更被赋予了降魔除灾、愍济众生的内涵。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灌顶经》载:“我法既灭,末世之中。鬼魔乱起,行诸邪恶,烧恼人民。……为说无上灌顶章句大神王名字,守护万姓故。使得安隐,离诸危厄,度于邪恶。使诸魔鬼,不得作害”^[46]。佚名的《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



图一二 东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弥勒像



图一三 东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弥勒像底座右侧面神王



图一四 东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弥勒像底座背面神王



图一五 东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弥勒像底座左侧面神王



图一六 东魏北齐彩绘莲华像座

心相经》载诸天神王闻佛说法而立誓护持三宝，令法界众生安住佛法，“时会中有天神王、地神王、海神王、河神王、山神王、树神王、风神王、火神王、诸鬼神王等，从坐而起白佛言：‘世尊，我等诸神王在所佐护受持此经之人并及供养受持经人。弟子常为此人不使见恶，所求如意。其人行来，我等常送不令恐怖，亦复不使恶人恶鬼横害。其人所须之物，我等冥会使之自然。而得生之处，常与明师相遇，永离愚钝’”^[47]。

齐隋之际邺下名僧灵裕开凿的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窟门两侧镌刻两身高大的护



图一七 东魏北齐彩绘莲华像座右侧面神王



图一八 东魏北齐彩绘莲华像座背面神王



图一九 东魏北齐彩绘莲华像座左侧面神王



图二〇 北齐天保元年长孙氏造阿弥陀像



图二一 北齐天保元年长孙氏造阿弥陀像底座右侧面神王



图二二 北齐天保元年长孙氏造阿弥陀像底座左侧面神王

法神王立像，均身披甲冑，手持长剑和三股叉，侧上分别题刻“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48]。两神王均颌首屈颈，面容悲戚，正合文献所载“面别镌法灭之相”^[49]。

时至唐代，神王造像实物无存，但各类文献中仍有不少记载，其意义亦涉及守护佛法，如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载：“其坛相状，下之二重以石砌累，如须弥山王形。上下安色道，四面坛身并列龕窟，窟内安诸神王。……戒坛周围布列神影者，表护持久固之相也”^[50]。《律相感通录》中戒坛基座上也有类似记载：“祇垣一寺，顿结三坛。两居佛院，唯佛所登……。僧院一坛，为受具者。庄严列窟，如须弥座。神王石柱，守护不亏”^[51]。陀罗尼经也记录了造像底座上绘出的神王形象：“其像座下，画作香炉供养之具。其供养具左右两厢，各画布置八神王像。其神王色，青黄赤白各为一色，面作威怒。一一神王，各着五色金银细甲。各执器仗，威严而立五色石上”^[52]。从上述文献可知，至唐代，神王像依旧安置在建筑物基坛或造像底座的小龕之中，身具甲装的服饰与守护佛法的功能与北朝晚期一脉相承。

五、结 语

北吴庄出土石塔为北朝晚期邺下流行的单层覆钵式塔，主尊是北齐天保年间以来出现的新样式佛像，菩萨有东魏晚期至北齐初年特征，龕型是典型的北齐镂空透雕双树背龕，时代应属北齐较早阶段，是北齐与西域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考虑到北朝晚期邺下流行的三佛及观世音信仰，参考同时期的造像题刻，石塔四面造像组合或与释迦、弥勒、阿弥陀和观世音有一定联系。北齐石塔基座上的神王像是邺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极为常见的护法形象，服饰、姿势特点鲜明，组合方式多样，

以八身和六身最为普遍，其流布与北朝晚期盛行的末护思想关系密切。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古国家大寺及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编号为19VJX069）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第70~73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 [3] a.梁思成等：《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见《梁思成全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b.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八卷第十一洞図版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3年。
- [4] 何利群：《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与“邺城模式”》，《考古》2014年第5期。
- [5] 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図版篇二）第155~156頁，吉川弘文館，1995年。
- [6] 何利群：《北齐“龙树背龕式”造像的技术传承和构图特征》，《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 [7] 唐仲明：《中原地区北朝佛塔研究》，《考古》2016年第11期。
- [8] 赵立春：《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述论》，《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 [9]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図版五七、五八及一一A，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
- [10]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宝山灵泉寺》第6~7、23~58页，图七五至图七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1] a.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図版篇二）第343~348、546頁，吉川弘文館，1995年。
b.齋藤龍一：《大阪市立美術館山口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彫刻》第92、93頁，大阪市立美術館，

2013年。

c.[新加坡]陈清香：《神通寺四门塔探源》，《中华佛学学报》第17期，2004年。

- [12]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第31~35、76~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3] [意]卡列宁、菲利真齐、奥里威利编著，魏正中、王倩编译：《犍陀罗艺术探源》第87~93、115~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图14、55、82，（二）图49、104，（三）图118~123、176~177等，文物出版社，1989~1997年。
- [15] a.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92~300页，黄山书社，1987年。
b.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
c.同[4]。
- [1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7] a.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一）、（二），《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1993年第1期；《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
- [18] 刘慧达：《北魏石窟中的三佛》，《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 [19] 何利群：《邺下净土信仰及相关遗存》，《中原文物》2018年第4期。
- [20] 小南海中窟窟门上方刊刻的《方法师镂石板经记》载：“大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佛真容，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相好斯备，方欲刊记金言，光流末季，但运感将移，暨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寺奄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依准观法，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参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 [21] a.李裕群：《关于安阳小南海石窟的几个问题》，《燕京学报》1999年新6期。
b.[日]仓本尚德：《从刻经看邺城佛教：以

小南海石窟与北响堂山石窟为中心》，见《石经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

- [22]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第22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释迦、弥勒和阿弥陀三尊组合在唐代以后依然流行，惟主尊顺序略有变化。如龙门石窟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魏牧谦像龕并序“为亡妣造阿弥陀佛像释迦牟尼像弥勒像合为三铺同在一龕”。参见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23]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 [24] a. 周到、吕品：《河南浚县造像碑调查记》，《文物》1965年第3期。
b. 謝振發：《北響堂山石窟南洞北齊石經試論——唐邕的刻經事情をめぐつて》，见《中國美術の圖像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6年。
- [25] 王景荃主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第244~250, 277~284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
- [26]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三第14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 [27]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219~23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8]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第104、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29] [唐]道世：《法苑珠林》，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389、411页，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简称《大正藏》。
- [30]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邳城考古队：《河北临漳邳城遗址出土的北朝铜造像》，《考古》1992年第8期。
b. 同[1]。
c. 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象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
d. 冯贺军：《曲阳白石造像研究》第58~6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 [31] [晋]佛驮跋陀罗：《大方广佛华严经》，见《大

正藏》第9册第718页。

- [32] [宋]昙无竭：《观世音菩萨授记经》，见《大正藏》第12册第357页。另唐菩提流志译《一字佛顶轮王经》有“画观世音菩萨，身白黄色结跏趺坐。左手胸侧执开莲花，右手扬掌曲躬瞻佛”，参见《大正藏》第19册第230页；唐李通玄撰《新华严经论》有“见其西面岩谷之中，观世音菩萨于金刚石上结跏趺坐”，参见《大正藏》第36册第981页。
- [33] [清]王旭：《金石萃编》卷三六，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一册第625~628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该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编：《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第七卷第95~1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 [34] Emmy C. Bunker, *The Spirit Kings in Six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XVIII, 1964. 骆子宽造像底座右侧第三身神王榜题残缺首字，原文作者据其双肩负鱼的特征将其命名为鱼神王 (Fish Spirit)，中国学者根据佛经中各类神王的名称认定应为河神王。
- [35] Edouard Chavannes, *Une Sculpture Bouddhique de L'Annee 543 p.c.*, *Ars Asiatica*, Vol. II, 1915.
- [36] a. 常青：《北朝石窟神王雕刻述略》，《考古》1994年第12期。
b. 赵秀荣：《北朝石窟中的神王像》，《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
c. 金申：《关于神王的探讨》，《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
d. 殷光明：《试论北凉石塔基座像与神王》，《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e. 李裕群：《神王浮雕石佛座拓本考释》，《文物》2010年第7期。
- [37] Liqun He, Petra Rösch, *Style and Iconography in the Buddhist Imagery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Heart of Enlightenment—Buddhist Art in China 550-600*, pp.42~45, Köln: Druck Zentrum Kölnwest, 2009.
- [38] 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大智度论》、《思惟略要法》，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均已提到末法之世。而道朗为北凉县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作的序中则明确提到了

末法时代。如南朝梁僧祐著《出三藏记集》载“佛涅槃后初四十年，此经于阎浮提宣通流布，大明于世。四十年后隐没于地，至正法欲灭，余八十年，乃得行世。……至于千载像教之末，虽有此经，人情薄淡，无心敬信。遂使群邪竞辩，旷塞玄路，当知遗法将灭之相”，见《大正藏》第55册第60页。

[39] 王毅：《北凉石塔》，见《文物资料丛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

[40] 同[36]d。

[41] [日]藤堂恭俊、塩入良道著，余万居译：《中国佛教史》（上），参见《世界佛学名著译丛》44，华宇出版社，1985年。

[42] 李裕群：《郟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43] [北齐]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见《大正藏》第46册第786~792页。

[44] [唐]道宣：《续高僧传·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二十二》，见《大正藏》第50册第560页。

[45] 北朝晚期的刻经在形式和功能上不仅继承了早前的彰显、诵读、禅观乃至修积功德等目的，也赋予了刻经以护持佛法、保存经像、以备法灭的重要内涵。如山东铁山《石颂》中有“今镌搆逢劫火而莫烧……金石常存。……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参见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Cologne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 Buddhist Stone Inscriptions in Northern-China of the Heidelbe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Heart of Enlightenment—Buddhist Art in China 550-600*, pp.62~65, Köln: DruckZentrum Kölnwest,

2009。而邯郸北响堂山南洞外的《唐邕刻经碑》提到时值末世，简帛皮纸均难长存，为护法存经，发愿于名山大川尽勒佛经，以期永世不绝。《唐邕刻经碑》记载“晋昌郡开国公唐邕……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蔓经》一部，《字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岁次壬辰五月二十八日……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参见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南区1、2、3号窟考古报告》第99~107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46] [东晋]帛尸梨蜜多罗：《佛说灌顶经》，见《大正藏》第21册第504页。

[47] 《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见《大正藏》第85册第1400页。

[48] 同[23]。

[49] [唐]道宣：《续高僧传·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八》载“后于宝山造石龕一所，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镌法灭之相”，见《大正藏》第50册第497页。

[50] [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见《大正藏》第45册第809页。

[51] [唐]道宣：《律相感通录》，见《大正藏》第45册第881页。

[52] [唐]阿地瞿多：《陀罗尼集经》，见《大正藏》第18册第805页。

（责任编辑 付兵兵）

本期要览

湖南宁乡市罗家冲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罗家冲遗址2013~2017年的发掘发现了丰富的石家河文化遗存,清理了房址、灰沟、灰坑、长方形坑状遗迹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 etc 等遗物。这批材料,特别是3组高规格回廊建筑材料对研究湘中地区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特征有重要价值。

郑州市高新区东赵遗址小城发掘简报 东赵遗址2012~2015年发现了“新砦期”小城,现存基槽和城壕等,小城内、外有灰坑、窖穴、祭祀坑等遗迹。小城始建于“新砦期”,最晚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偏晚阶段废弃。小城的城内外遗迹应为“新砦期”早段。这批材料对研究嵩山以北地区“新砦期”遗存的文化内涵、“新砦期”的性质及早期夏文化等有重要价值。

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2017年墓葬发掘简报 海门口遗址2017~2018年的第五次发掘中发现了墓地。根据层位关系、墓葬形制和构筑方式的不同,集中分布的24座墓可分为三组,年代在公元前1500~900年。这批墓葬丰富了对海门口遗址丧葬习俗及聚落变迁的认识,为探索以石块构筑“大石墓”及二次捡骨分层丛葬葬俗的源流提供了新资料。

地中海东部折返式研磨石器的初步研究 地中海东部的折返式研磨石器中,徒手操作类(磨盘)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前陶新石器时代有较大发展。青铜时代形成了以马鞍形磨盘为主且不断改进的谷物加工技术体系。铁器时代出现了手柄操作类,“奥林索斯磨”代表了其巅峰形态。上述特点与地中海东部的作物品种、加工技术、饮食传统等有关。

邳城遗址出土北齐石塔及相关图像的探讨 2012年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了1件北齐石塔,是单层覆钵式塔,主尊是北齐天保年间以来出现的佛像样式,菩萨有东魏晚期至北齐初年特征,龕形是典型的北齐镂空透雕双树背龕。基座的神王像是邳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常见的护法形象,与北朝晚期盛行的末世护法思想关系密切。